

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

12
(第四分册)

文苑英华

安徽省政协《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第四分册

文苑英华

分册主编

陆德生 唐先田 徐天琪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苑英华

安徽省政协《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安徽省地质印刷厂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合肥市杏花印刷厂装订



*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68.6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7—5034—0408—6/K·0288

全套 (共八册): 66 元

前 言

作为《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第四分册的《文苑英华》，介绍给读者的是安徽近现代教育界、文艺界的一批著名人士。他们刻苦磨砺，求索不止，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增添了光辉。

在这本分册中，有被周恩来称为“一个毫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陶行知，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情怀，毕生倡导和推行平民教育，对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他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写下了火焰一般炽烈的作品，许多青年在他的作品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近代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程长庚，他不仅在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个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率领进京的徽班，融汇各路剧种之所长，为京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人们称为京剧的开山鼻祖；有著名的革命文艺理论家以群，毕生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而努力奋斗，他的许多论著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著名的黄梅戏艺术表演家严凤英，她以杰出的艺术才华，精湛的艺术造诣，使黄梅戏这个安徽的乡间剧种走向了世界，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在这个分册里，我们还可以读到关于书画艺术大师黄宾虹、林散之、汪采白、萧龙士以及铁画名家们终生为攀登艺术高峰而奋斗不懈的生动介绍；看到吕碧城、丁宁这几位女词人、女作家的才情和艺术风采；电影表演艺术家王莹和舒绣文坎坷曲折的艺术道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在他那个领域里所作的艰辛探索；张曙和田间是那样热情地以歌和诗为人民革命斗争和人类进步事业而豪迈地欢唱；此外，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张恨水，用他的辛勤笔耕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通俗小说；年轻的朱湘虽然英年

早逝，但是他飘逸的诗情却仍然使读者如痴如醉；还有钱杏邨、吴承仕、李辛白、丁易、刘希平、刘文典、许承尧等，他们治学育人，也堪称风范。

这本分册也介绍了个别复杂的历史人物，客观评介了他们的历史功过。例如胡适，我们既看到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闯将的形象，又看到他甘当推行蒋介石反动政策的“过河卒子”的身影。

从这个分册我们可以看到，安徽文苑里的许多英华，不管他们如何地聪敏过人，也不管他们的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的成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期刻苦磨炼的结果。这也就告诉我们，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凡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者，贪图走捷径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唯有曲径可以通幽，唯有百炼才能成钢。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必须继承和弘扬；安徽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有它自己所应有的位置，也必须继承和弘扬。任何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任何割断历史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前人刻苦自砺、勇于攀登的创业精神，去创造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文化。这便是编辑出版这个分册的主旨所在。

编辑出版中难免有疏漏讹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1年11月

《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编委会

主 编：史钧杰

副 主 编：光仁洪

常务编委：陈德辉

编 委：	殷树勋	陆德生	余乃蕴
	郭崇毅	徐则浩	方明治
	王鹤鸣	金其恒	刘景龙
	王志铨	吴寿祺	郭 因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传略	莫增荣 (1)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	
——李辛白传略	马俊如 (30)
安徽教育战线上民主革命的勇士	
——刘希平传略	徐善庆 (44)
学者·作家·战士	
——丁易传略	陈育德 (60)
由求学问的爱国者到爱国的学问家	
——刘文典传略	戴 健 (75)
由经学大师到共产主义战士	
——吴承仕传略	庄华峰 (92)
一个复杂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胡适传略	张先贵 (109)
孜孜追求真理的美学大师	
——朱光潜传略	张保铎 蒯大申 (132)
著名的现代文艺理论家	
——以群传略	鲍义来 (151)
笔阵纵横五十年	
——阿英传略	姚永森 (172)

安徽文史事业的先行者

——李则纲传略 李 嘉 (193)

短暂而燃烧着的生命

——蒋光慈传略 哈晓斯 (206)

精进不已的文艺通才

——张恨水传略及其成才之路 徐传礼 (223)

“投入泛滥的春江”

——朱湘传略 夏明判 (237)

时代的鼓手

——田间传略 朱移山 (253)

中国近代词坛女杰

——吕碧城传略 刘序功 姚卓华 (267)

安徽著名爱国诗人和文物收藏家

——许承尧传略 何 倩 (282)

富有传奇色彩的女词人

——丁宁传略 刘夜烽 (297)

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张曙传略 竹 笛 汪继长 (311)

“中华女杰”

——王莹传略 张先珍 (323)

徽班领袖 京剧鼻祖

——程长庚传略 雷 风 (337)

蜚声海内外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传略 自 萍 (351)

新时代的名优

——舒绣文传略 石 楠 (365)

近代杰出的中国山水画大师

——黄宾虹传略 马 彬 (383)

“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港”

——记林散之先生 田恒铭 (395)

融汇百家的新安画派传人

——汪采白传略 鲍义来 (408)

画坛寿星

——萧龙士传略 郝长恩 (424)

顽铁随心绕指柔

——记汤天池和他的传人 董伯信 (437)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传略

莫增荣

整整一百年以前，在安徽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教育家，他就是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早年因信奉“知行合一”说而改名知行，后又因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复更名行知。安徽歙县人。1917年留美回国，抱着“要使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投身教育后，30余载不改初衷，“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① 终其一生。

1946年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使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都受教育，倾注毕生精力，对中国教育的生路作了富有创见的总体探索，就是这位人民教育家的伟大过人之处。

立志教育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徽州境内的一个名叫黄潭源的普通小村落，这个地方在皖南文化古城歙县西10里许，位于黄山之麓。“清清练江水，翠翠黄山松”，陶行知曾用这样的诗句描绘故乡的风光。对于故乡徽州，陶行知终生一往情深。他称这

^① 此处及后文凡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块土地为“山毓水秀”、“人杰地灵”的所在。他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同徽州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古往今来，徽州诞生过众多杰出人物，被陶行知尊为“先贤”的有大教育家朱熹、江永、戴震，与陶行知同年出生的有大学者胡适，等等。陶行知称这些人为“我们徽州的土产”，引为自豪。陶行知本人也是“徽州的土产”。他从古老的徽州出发，沿着山间小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

陶行知的祖辈皆以自食其力为生，家境清寒。父名槐卿，学徒出身，曾在外县经营过一个酱园，倒闭后，返乡务农，仅有薄田4亩，穷困不堪。母名曹翠仂，是农家妇女，做过佣工，勤俭慈祥，操劳终生。1934年陶母逝世时，陶行知写了一首小诗纪念慈母，题为《吾母所遗剃刀》，诗曰：“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诗后加注说：“吾母治家，最为勤俭，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这剃头刀现在是我们最可纪念的传家宝了。”贫寒的家境，俭朴的家风，给陶行知的一生留下深刻影响。

陶行知少时敏而好学。6岁，父亲教他识字。7岁进一家馆伴读，竟能在3刻钟内熟背《左传》43行，聪颖过人。稍长，入歙县崇一学堂，学习语文、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成绩优异。是时曾题词以明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后两年，入杭州广济医学堂（系教会学校），因不愿“受洗”愤而退学。

1909年，18岁的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翌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金大就读期间，陶行知积极拥护辛亥革命，组织爱国讲演，募集爱国捐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先后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的编辑和主笔，以“知行”为笔名发表多篇文章，诸如《因循篇》、《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伪君子篇》、《民国三年之希望》等，探讨人生和社会问题。在他撰写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抒发了青年陶行知要“使中华放大大光明于世界”的为学之志。

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在毕业典礼上，陶行知满怀激情地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阐述了他的民主共和思想，以及他对共和与教育的关系的认识。他指出，“共和之险象”在“国民程度不足”，“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而“改良个人”舍教育别无选择。他认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由此他得出结论，有赖教育“养成完善之国民”，既是社会之“大任”、又是社会之“大利”之所在。当时他虽然还未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教育是不可能搞好的，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他开始以一颗赤诚之心，投向祖国教育事业，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

同年秋，陶行知筹资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同窗。这所学校开设了《教育管理》的课程。担任这门课程的年轻教授柯夫曼，是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学识渊博，思想活跃。陶行知特别喜爱《教育管理》这门课程，柯夫曼对学习勤奋的陶行知也格外看重。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同时也谈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以及自己的抱负。有一次，柯夫曼邀请陶行知和孙科一同到他家度周末。当柯夫曼问及两个学生学成回国后各有什么打算时，孙科抢着回答：“我要去担任南京市长，把南京整治得象纽约一样，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他还希望陶行知能做他的助手，担任副市长或市府秘书长。陶行知说：“我可不想做官，我要回国办教育事业。”柯夫曼深情而又赞许地看着陶行知，他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不过近代是落后了，急需兴办教育事业，提倡科学和民主，开发民智，振兴国家。”

陶行知从柯夫曼的赞许中得到了鼓舞。在国外，他亲眼看到，美国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民富国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普及，科学发达。他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进一步作了思考，更

加坚定了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教育的决心。

陶行知完成了伊利诺大学市政专业的学习，并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以后，为了实现自己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1915年暑假，他在伊利诺大学夏季馆进修了《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心理学研究》等课程。同年，他又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研究部，成为杜威、孟禄的学生，与胡适同窗，专攻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1917年7月13日，陶行知同一批留学生一起，登上了归国海轮。同学少年，意气风发，壮志满怀。在船上，留学生们面对滔滔海浪，抒发自己回国后的抱负。有的说要涉足政治，有的说要创办企业，有的说要发展体育，陶行知则说：他认定了教育事业，他要使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

有人问陶行知：“中国人贫穷、落后，大家都受教育，有必要吗？”

“怎么没有必要！好的教育是人生的必需品，它和空气一样，是人人不可少的。”陶行知回答。

又有人问：“需要不等于可能，你有什么办法，能使全中国的人都受教育呢？”

是的，怎样才能使人人都受教育呢？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儿呢？陶行知面对滚滚大海和拂拂海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从此，陶行知开始了长达30年的探索中国教育道路的非凡生涯。

普教先声

陶行知投身教育时正值“五四”前后。是时，中国封建教育虽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传统教育的深厚根基并未动摇，弊端犹存；新学堂虽已开办数十年，但多数中国劳苦大众仍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华夏大地依旧文盲充斥。尤其是教育上“仪型他

国”的流弊相当严重，陶行知将此称之为“拉东洋车”，指出这种照搬外国教育的结果，不但不能改造传统教育的“老八股”，相反地还会拉来洋化教育的“洋八股”。中国教育已“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中国教育需要探索一条新的生路。既要普及，又要革新。普及和革新，是陶行知一投身教育就抓住的两大主题，也是他弹奏了一生的两大主旋律。普及，就是“让教育之光照射到每一个角落”；革新，就是“要探寻真正适合中国向前进取的教育”。

陶行知回国后，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1922年底南京高师归并入东南大学，他出任教授与教育科主任。讲授过《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西方教育理论。1923年夏，筹办并被推选为南京安徽公学校长。这一时期，陶行知主要致力于学校教育的革新。他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的“五旧”弊端（即“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主张以教育实验“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他积极推行“学生自治”，主张“培养‘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他竭力提倡女子教育和“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他努力建构“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他大胆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改革主张，尤其是以“教学法”取代“教授法”的主张，遭到一些教授的抵制和反对，有人公开说他“标新立异”。陶行知并没有退却，继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时，“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南京高师率先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进而向全国推广，并从此沿用下来。陶行知遂成为在中国倡导“教学法”的先驱。

20年代初期的陶行知，刚刚30出头，既是沐过欧风美雨的大学教授，又担任着高师教务长的要职，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生活也很优裕，为一般人所艳羡不已。但人各有志，陶行知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他身居“象牙塔”，心里想着的却是全社会的劳苦

大众，他总是感到：只要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未受到教育，就是自己未尽到一份责任。陶行知自称是“一个中国的平民”、“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有着丰富的“中国性”和“平民性”，“经过一番觉悟”，他的在全社会普及教育的热情，“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之路奔流回来了”。从此，陶行知和他的教育事业一道走向了人民，如同一叶风帆，向着亿万劳苦大众的无边的大海远航而去了。

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和朱经农合编了《平民千字课本》。同年7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合家迁居北京，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主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为普及和探索中国教育，陶行知开始了新的起步。

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平民读书运动”，陶行知将其看成“普及教育的先声”。他指出，“这种教育是要用最少时间、最少经费，教导年长人民读书识字爱国做好人”，也就是“家家读书，人人明理”。他还把“人人读书”看成“改造社会的出发点”，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陶行知的心目里，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人人有面包吃，人人有水仙花看”，教劳苦大众读书，就是送给他们“水仙花”，而又不会使他们丢掉“面包”。这是陶行知终生向往而又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境界。

陶行知怀着极大的热情，一心扑到了平民教育上。他抛家不顾，奔走数省，宣传平民教育；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组织平民学校；他绞尽脑汁，创办平民读书处，发明连环教学法，以保证劳苦人民“在谋生之外还能读书”；他怀揣《平民千字课本》，走到哪里教到哪里。他说他“立志凡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他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到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善所里”，“叫黑暗的地方大放光明”。锦绣江南，留下了陶行知来去匆匆的脚印；广袤塞北，出现了陶行知风尘仆仆的身影。在南昌，他对监狱400名犯人演讲；在

张家口，他向内蒙古政学各界人士宣传平民教育；在北平，他开办了100多所平民读书处，自己的家门口也挂起一块“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并动员儿子晓光教祖母识字。他把平民教育的种子撒向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时平民教育风靡全国，掀起了高潮。

陶行知是安徽人，尽管没有在省内任过职，但他对故乡一往情深，关心桑梓教育。他自称对安徽的教育“负有特别责任，不能不勇猛进行”。为在安徽推进平民教育运动，不遗余力。他写信给歙县知事汪镜人，为数十万歙民请命，劝勉这位县知事“做一天官就得干一天事”，注重推广平民教育；他写信给安徽省教育厅长卢绍刘，希望卢“不但要做数万学生之教育厅长，还要做三千万人民之教育厅长，做平民教育厅长”，并向卢提供了搞好平民教育的10条建议；他还亲自到芜湖、安庆等地宣传、推广平民教育。

那是1923年10月中旬，陶行知来到安徽省会安庆，帮助成立省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安庆停留的短短十几天里，他为宣传平民教育夜以继日，四处奔走，马不停蹄。10月20日，他向女子师范学生演讲女子领袖对平民教育之使命；21日，上午对圣公会学生讲平民教育，下午对全城牧师布道团讲平民教育；以后几天，又先后对全城小学教员、全城商人、全城警察、私立学校学生、苦儿院学生、机关公务人员等演讲平民教育；还向私塾先生讲了私塾与平民教育的关系，向和尚讲了宗教与平民教育的关系；同时，还与省公署和其他官厅、陆军、海军、监狱当局接洽，进行宣传；还抽暇到菱湖公园、江裕船上、机关街道，找那些不识字的，随地施教。10月28日那天，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动员大会，到会计有官、商、军、警、民、学、教会各界人士17000余人，陶行知到会作了平民教育演讲。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沿途旗帜飘扬，鼓号杂作，全城无不震动，盛况空前。安庆的平民教育就此推上了高潮。

从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身负推广普及平民教育重任，先后到过江苏、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内蒙、杭州、上海、武

汉、开封等省市，做了大量的具体组织、宣传、实验工作。他一年到头四处奔走，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有两年的春节都未回家，是在旅途中过的。1924年春节，他曾写过一首小诗，叫《车上过年》，其中有两句是“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写的正是这一情景。

开辟晓庄

尽管陶行知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平民教育运动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陶行知开始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教育的改造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江南农民运动汹涌澎湃，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以“教育革命”来配合“国民革命”的主张。他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正是国民革命的势力高涨之秋。唯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平民教育运动虽因社会条件不成熟而停滞，陶行知的思想认识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当时的中国是以农立国，全国有八分之七的人口在乡村。早在平民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际，陶行知就清醒地认识到：“现今办教育的人总要在城里热闹，那冷静的乡村实在没有人过问。但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村去的运动。”从1926年开始，陶行知的注意力转到了乡村教育。他决心把整个的身心都献给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向农民“烧心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第一个重视和实践农村教育的教育家。

通过深入的乡村社会调查，陶行知发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羡慕豪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这种不适应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需要的